

忆 开 辟 新 区

秦 定 九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南平解放，中央调“南下”的干部，八月份到达。县委根据中央开辟新区的政策和指示，针对南平当时土匪多、民不聊生的情况，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成立农、青、妇和武委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以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

在剿匪斗争中，坚决贯彻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执行了省军区“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的办法；主力部队为骨干英勇出击，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积极配合勇敢作战。到一九五一年五月底，全县军民共歼匪3409名。至此，全县股匪即基本肃清，只留下些零星散匪了。剿匪斗争的胜利，人民武装的强大，创造了安定团结的环境，为后来南平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反霸减租减息斗争，进行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之后，就开始进行第一期土改，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基本结束，全县157个自然村完成106个。接着进行第二期土改，到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结束。全县共没收征收和分配了土地244,997亩，房子5539间，还有耕牛、农具、木材等。全县得利农民20,720户，99,699人。

经过土改，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喜气洋洋，说：“千好万好不如共产党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经过土改，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主动向政府报告土匪的行迹，积极协助剿匪，对彻底歼灭土匪起了重要的作用。

剿匪斗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完成，给南平各项建设事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一九五三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附：秦定九同志给文史办的信

南平市政协文史办：

我因外出，八月上旬才看到你办7月17、21日的来信和寄来的两份材料：《南平县土地改革概况》、《南平县剿匪经过》。

这两份材料，我看后，认为写的很详细、很好。我因手头缺乏资料，提不出具体意见。对《南平县剿匪经过》，提点参考意见。

一、剿匪经验中，对正规军的作用应强调一下。我记得1950年一个时期我军调走，土匪活动很疯狂。后调来部队，听说那里有土匪就去追剿，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劲头也就大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就打下了。

二、土改发动了群众，对剿匪起了重要的作用。

土改前，群众害怕土匪杀害，有的给土匪送信、送饭还掩护。土改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又武装了起来，不但不给土匪送信、掩护了，还向我政府报告土匪消息，对剿匪起了重要

的作用。我记得土改后，才彻底消灭了土匪。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三、土匪疯狂举一例。南平到建瓯的路上经常发生问题。还发生了绑架援助我国的两名蒙古医生，后虽被释放，引起中央对福建剿匪的重视。

四、贯彻中央剿匪政策很重要，文中已提到。我举一例。春节前我到二区大坝，区干队打土匪捉到两名，当即将头砍下，用粪箕挑到区上，我批评了他们并讲解不杀俘虏的政策。

五、文中提出：1950年3、4月间是“最困难时期”，“匪特趁此大肆活动，拉一些薄弱者下水”。这期间，樟湖板区干队（编者注：是武步自卫队吴有团）十余人带枪投匪。

六、峡阳山上隐藏一土匪大头子被捉。民兵发现给这一头子送饭的，就组织围剿，终于捉住。名字不记得了。

写以上几点不成熟意见，仅供参考！

专此，顺致

敬 礼！

秦 定 九

1986.8.11.上午于北京

（秦定九同志 1949年8月至50年5月曾任南平县委书记，后在北京等地任职，现已离休）

难忘的岁月 伟大的人民

南平县解放头三年的一段粗略回顾

武彦荣

南平县（现在的南平市）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获得解放。前边的三个月，以当时驻军的132团、151团和29军的261团为主体进行工作。主要的是支援大军过境，遣散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处置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等等。这都给后来的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八月份一大批南下干部到达后，进入了全面开展工作的阶段。把那三年多的斗争与工作回顾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下面便是极其简略的而又针对若干主要之点的粗略回顾。

一、关于剿匪斗争

当时确是形势大好。但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则又是另一种情景，那就是：敌情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的，环境是艰苦的，任务是繁重的。威胁最为直接的，首先是数以千计的土匪。区乡干部多次被包围，运输车船一再受袭击。在南平县城内，还发生过一名警卫员被打伤的事。就从程楷同志编写的史料中所举出的那些尚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也不难看出匪情之严重程度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直接的受害者

就有2,800多人和户,其中:被杀者189人,内区干部10人,村干部与积极分子106人,一般群众73人;受伤者90人(内区干部2人,村干部与积极分子36人,一般群众52人);先后被抓去的381人(内村干部与积极分子237人,一般群众144人)。的确是“匪患不除,国无宁日”。在一个时期内,剿匪斗争是被列为最突出的任务的。

任何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势力,都是注定要灭亡的,猖狂一时的各股土匪当然也只能是如此。经过不到两年时间的英勇斗争,各股土匪就被我们全部消灭了。总计被消灭的土匪是3,600多人,内有匪首200余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最主要的作法与经验是:1、坚决地贯彻执行了有关的方针、政策,如军事进剿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以及“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和政策等;2、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这三者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而且越往后越显示出以广大民兵为主体的群众性剿匪的巨大作用;3、剿匪斗争与其他各项工作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相互为用;4、从县一级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要首先具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也是关系甚大的。在上述这四个方面中,都有不少生动事例与成功经验是值得很好地回忆与总结的。比如,地委负责人一再表扬过的关于“开辟江汜工作”的经验,就是其中的一例。希望能够陆续阅读到知情同志所写的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史料。

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对彻底肃清土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最终

制土匪于死地的，那是伟大的土改运动。

二、伟大的土改运动

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是在通过剿匪、反霸、减租、恢复与发展生产、合理负担与支援前线等一系列的活动，广大群众逐步有所发动的基础上开始的。要进行土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提前一年于一九五〇年冬季即进行土改，这却是我们不曾预料到的。这是由于美帝侵朝战争迅速扩展至我国边境和国民党也可能要冒险进犯大陆这样的原因，而迫使我们做出这种决定的。省委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日召开紧急会议，接着地委也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与布署，就这样，土改运动便开始了。因为是这样开始的，当时的具体困难不少，有的且相当尖锐，主要的是：第一、包括我们在内，大家都缺乏思想准备；第二、能够立即投入的干部不仅人数少，而且大都没有搞过土改；第三、匪情还很严重，这须认真对待；第四、工作任务很重，这须妥善安排。我们的土地改革，就是在不断克服与战胜上述种种困难的征程中前进的。

在全县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地完成了土改任务。这一仗还是打得很漂亮、很出色的。包括开始试点，两批土改，分配山林，查田定产以及最后颁发土地证的全部内容，只用了十个月便全部完成了。刚开始之后的四个月，就已经在52个乡所属的106个村（含450个自然村）将近10万人口的地区内完成了土改。土改强有力地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例如剿匪斗争，一九五一年的头三个

月，就消灭了土匪14股，计1,554人；其中民兵单独作战249次，歼匪813人（打死24人，打伤15人，活捉319人，自新455人），另瓦解大刀会848人。又如缴纳公粮，不少村子只几天时间便完成了，而且质量很好。

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既稳且快又好”地完成土改任务，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省委和地委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二是实行土地改革，那是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贫雇农）的迫切要求，由此爆发出来的力量，的确是无比巨大的。此外，县委、县府和土地改革委员会在实施组织领导方面，也是很成功的，主要的是：

一、认真试点，以点带面，从点到面，逐步展开，分批完成。开初，地委决定在南、古、尤、沙、顺五县七个乡镇进行试点，内南平县是五区西芹，四区徐洋和八区埂埕三处。八区埂埕既是县委的点，又是地委的点，而主要是地委直接掌握的。县委亲自抓五区西芹和四区徐洋。西芹这个点由我负责。组织了相当强的工作组。西芹工作组由十二人组成，内有武冲天、王桂芳、岳健、刘忠汉、魏夏涛五人为正副组长。徐洋的工作组组长是郝世文，埂埕的工作组组长是曹有璧。十一月廿一日开始行动，仅用一个月零五天就基本完成了。十二月廿六、廿七日两天进行汇报总结。两天的会议开得热气腾腾。贾久民同志对三个点的工作都给予很好的评价与鼓励。这三个点为全县的土改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实实在在的宝贵经验。

二、把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与坚决执行政策，注意依法办事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分隔开来，更不是对立起来。例如，在被严厉镇压的匪首、恶霸及罪行很大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百分之七十几的人是经过人民法庭或大会公审而后才处决的，直接用布告处理的只占少数。

三、把鼓励广大干部积极参加土改，与通过土改锻炼，培养干部有意识地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后投入土改的脱产干部是八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边学习、边行动，从实践中学会搞土改的；有一部分更是从前边的点上选拔出来的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今在位的不少县团、地师级干部和个别部、省级干部，有的就曾那时候的土改工作组（队）的成员。

四、各项工作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共同前进。例如，西芹镇的缴纳公粮，只四天便超额完成，而且质量很好。当时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和“早交粮，交好粮，争取当模范；早交粮，早分田，彻底闹翻身”，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而在上一年度的征收公粮，则是拖了一年之久才完成的。

总之，南平县的土改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一些经验与体会也是很宝贵的。当时的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同志，曾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份单独听取汇报，并给以鼓励。

三、需要认真对待并用心做好的若干个新的课题

除开上述两项工作之外，还有一些也是新的课题，需要认真对

待，用心做好的。这不但对于大批新干部是如此，就是原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以及从老区来的同志也不例外。幸好，都还算处理得比较好。

第一个是工作任务很重，得要妥善处理。当时的做法是，把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前进。例如，支前工作，恢复与发展生产，金融贸易，财政税收，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交通邮电，市政建设以及工商联的工作，教会工作等等，就都是一开始便都排到了议事日程上的，都做得比较好的。结合土改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的工作，也做得很好。

第二个是，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工作。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南下干部，原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干部，新招收的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先后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以及当时的留用干部等等；一度前来参加土改的干部中，就有华东团校来的，“革大”来的，地专及分区来的，卅二军来的等等，确实是来自五湖四海，革命把大家汇集到一起了。地委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我们认真对待，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第三个是，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把一切能够与我们合作共事的人，最大限度地动员与团结起来，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以县人代会为例，仅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份以前，即已开了七次，后来还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大家开诚相见，民主气氛较好。既是有力地推动着各项任务的完成，又使我们县区乡三级的党政干部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与监督。

四、难忘的岁月，伟大的人民

现在，已进入南平解放后的第三十八个年头了！一九五二年年底以前那一段，只有三年零八个月，那是很短暂的。可是，那个短短的三年多，却是印象很深而永远不会忘记的。光荣牺牲的同志（如罗春仲和饶嗣春），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一切的一切，都是包括各界人士和广大干部在内的全县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是我们的老师和亲人，我们始终都是感激的心情。因此选用了这样的题目：“难忘的岁月，伟大的人民”！

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于上海

附：武彦荣同志给文史办的信

南平市人民政协文史办诸位同志：（并抄致史志办）

最近的两封来信于昨天（八月五日）收到，十分高兴。看了包括吴义栋同志七月九日的信在内的三次来信，使我对于你们的整个打算和进展情况，比较清楚了。为了群策群力把这件事办好，再写这封信，而且是较长的信，以便把有关的看法、建议等，尽可能略为系统地写一下，供作参考。前天（四日）寄去的信和稿件，请注意收阅。

（一）那三年零八个月，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值得认真写写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其共性与个性的道理一样，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时期，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与地位，自然也是不尽相同的。那

个三年零八个月的一段，就属于值得很好地写一写的阶段。第一、那是属于新时代和新纪元的开始。第二、不只是南平县，就在更大的范围内，那也是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如全国性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和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就都是发生在这期间的。第三、不少事情是属于有待逐步探索的新事物，如县和县以下的人代会就是其中的一项。第四、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怎样才能相处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课题。回忆及此，深感那一段的确是值得很好地认真地群策群力地全面地写一写的。

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的是：南下来的，原地下党、游击队和城工部的，在上海与本省招收的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部队转业干部，陆续培养、提拔起来的大批新干部，当时叫作“留用人员”的留用干部，以及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少人也是干部或相当于干部）等等。前来参加土改的干部，其来源同样广阔，计有来自华东团校的、省里的“革大”的，地专机关及分区的，驻军三十二军的等等。横向分类，又可以分为四大类别，即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怎样才能很好地把这么多的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协同作战，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人们，真正搞好确也不容易。可是，我们当时算是处得比较好的。依我看来，光说这一点不就值得用相当的篇幅好好写一写吗？更何况，应当写的绝非这一点，各方面可写的资料是很多的。

（二）关于组稿用稿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粗想，同样可以采用专门机构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比如“救火”与“反特”那样。除了你们辛勤努力外，建议适当扩大范围进行组稿。不可能被征稿的同志都一定来稿。来稿也不一定全都收录；不收录的，可分别处理，如报上选登，转给史志办，暂时存档，留待后人用等等。打算用的，一期容纳不了的，可考虑再出续集。退许多步说，每个同志自己写写，也是会有收获的。我自己和魏夏涛同志这一个月多的感受与体会就是如此。一段笔记往往要看好多遍。一幅照片也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好似我们又回到当时的岁月中去了。回忆往事，思绪万千。光荣牺牲的同志（如罗春仲），又“出现”在眼前了。大家成天奔忙的情景，又“回来”了。想起了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想起了与我们长期合作共事的纪廷洪、周春木等人的种种情形。甚至于连城区的明翠阁，五区的一座寺庙（叫伏虎庙还是开平寺），以及三千八百坎半山腰萨镇冰书写的石碑，也都“出现”了。我们的心又“飞”回到了终身（生）难忘的第二故乡——福建，尤其是南平了。

可以考虑征稿组稿的范围和对象，有以下各个方面：一、是当时的党政军民的负责人及部门的负责人，如秦定九、周道纯、翟万昌、程克、李金全、李晋湘、武冲天、林关金、王桂芳、宋文正、李一丁、赵亮、肖军、赵秀玉、胡昌等。二、是当时各区的负责人和区主干、如陈郭锁、杨章锁、岳健、李怀智、王彪、刘忠汉、王启贤、赵春来、郑本善、刘书木、李桂荣、王靖一、任德贞、成桂、李玘鸿等。三、是南下服务团和

“革大”来的成员，如马庆雄等。四、是部队转下来的同志，如周道群等。五、是大批新提拔的干部，如胡诏隆、吴义栋等（吴义栋同志已在动手，那太好了）。六、是当时的人民代表，如卢世钤、陈达英、蔡水妹、丁喜妹、张荫棠等（其中，有的可以走访）。七、是原地下党、游击队和城工部的干部，如肖杨、祝振宏、黄二哥、吴全婢、刘中钊、方菊英等。这些同志写材料时，在有的内容上还可以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以前的情况加以对照。再就是，也还可以考虑走访当时的上级领导同志。总之，可以扩大范围组稿，以达到“众志成城”的目的。“双溪锁钥”的延平，是大有文章可写的。注：有的名字可能不准确，请核对。不少同志已去世，那是没有办法了。

（三）我曾提及的四个材料是怎么回事，和如何寻找

四个材料是两种情况。有三个是《福建日报》全文刊登过的。这是指：1、以秦定九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名为《南平县的人民武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大意）；2、题为《江汜变了》的通讯性质的报导；3、西芹镇土改基本结束时，镇干部和广大群众写给张主席的信。刊登的时间是：前两者，在一九五〇年的九、十月间，后者是一九五一年的一、二、三月份。报社总会有的。你们不妨在有事去福州时顺便去报社复制带回，以便了解。

另一个是饶嗣春的纪念碑文。他是大历口人，于一九四九年农历八月十二日遇害。立碑的日子是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三日（农历八月十二日）。此碑还在，可向其子了解。他的儿子是医生，就在南平工

作。我手头有两个抄件，一个复制件。复制件是池钟联、陈宇康、余燧仙三位同志给弄来的，还算清楚。

我举出这些的意思是，如能适当选用些当时的东西，也有其意义，即可能更逼真些。史志中这种情况也不无先例。至于说是否选用，那是要你们决定。这四份材料，都是我在亲自参加当时的斗争中写的。其中，一九五〇年八月廿三日至九月廿六日，我都在五、六、七区下乡，广大干部群众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与经验。

可以写的素材的确不少。再举三例如下：

一个是惯匪麻子路拒不投降，且继续作乱。有一晚，带其匪徒包围了五区南洲的土改工作组，但是未敢下手而溜走了。因为工作组中女同志较多，她们喜欢唱歌，土匪不知究竟，被这歌声给吓跑了。假如土匪攻打，那损失会是很严重的。

二是，大历口北面的白沟村，有一人名叫白义凯，此人民愤很大。主要是：当过保长、保代表，当过土匪的事务长，杀死翁章选，强占村公产，并“勒令”全村写保证，不得通所谓“共匪”。群众抓住他，要求就地枪决。这与审批手续不符。连开两次会，都不得解决。于是，只好我亲自去了。是巫春亮陪我去的，现任省委组织部的处长赵洪岗同我去的。去了以后，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八点多，都未能解决问题，大家都不肯散去，非要我批准不可。最后，我对大家说：这个人罪行不小，应当严办。据我看，是可以枪决的，但是不能马上就枪决。我虽然是县长，但也没有批准权，不可以一个人办这个事。你们如果相

信我，就把他送到县里去；一旦批准了，可以押回来就地枪决。如果还是非现在就杀不可，那就：我批准，你们把他杀了。接着，你们把我捆起来，送我回县，我去受处分。这样反复讲了几次，他们终于明白了，才算得到解决。回县后向地、县委汇报讲到这个事例时，许多同志表示赞赏，地委书记贾久民同志更是赞不绝口，认为办得好。

三是，我们到达南平不久，就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七日至十月四日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小学教员会议。大家认真学习，同时也敢于畅所欲言大胆提出问题进行探讨。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有些属于如何指导工作的建议，正是他们提出的。大家对我的启发帮助不小。幸好当时的笔记还在，一旦能抽出时间时，单独整理一下也是值得的。

总之，可以写一写的生动事例会很多的。大家动手动口，必将大有所得。

（四）你们在为 人民立新功

人们敬仰司马迁等史学家，那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历史上许多事情缺乏记载，或是不全不准，使后人犯愁。你们辛勤努力，把这许多史实写成文章，正式出版，留传后人，实非小事。有人说，文史工作，史志工作，是“既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出力不讨好”的事，那是不对的。可是，类似的看法确是有的。正因为这种工作可能不为某些人所重视，可能被人看不起，那就更加应当受到尊重。历史，是公正的。作为曾在南平工作过三年多的人，要深深地感谢你们的。我们当时虽也算是比较细心的人，但回头来看仍嫌细心不够。

当时未能更多地留下成文的东西，以至才不得不有今天大家的奔忙，从这点上看，就更是要感谢你们各位同志了。

（五）一点建议

史志工作与文史工作关系密切。建议你们之间要多通气，多联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取材一致，论定一致，尤其重要。前几年就曾向张全福、吴义栋同志建议，希望能够及早组织编写解放后的史料。现在成为现实了，当然是格外高兴的。否则，就将丧失时机，并为今后的工作留下很多的本来有可能避免的困难。

仅供参考。不当处，请指正。一些照片，随后寄来。

武 彦 荣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于上海

（武彦荣同志1949年8月至52年10月曾任南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兼县长，并兼任县大队长和县大队政委，后到上海在一机部、三机部、国防部和科学院所属的科研（设计）部门任职，现已离休）

王桂芳给南平市政协文史办的信

南平市政协文史办同志：你们好！

“南平县土地改革概况”和“南平县剿匪经过”
(初稿)收到。阅后感到政协文研会同志们花费不少精力，根据市档案馆材料整理成为两篇综合性史稿，将载入《南平文史资料》，可喜可贺！祝你们早日付印。

致 礼

王 桂 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五日

(王桂芳同志，解放初期曾任县府秘书、县长、县委书记等职，现已离休)